

#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前後的輿論風潮、外交糾葛及社會思想變遷

曾 榮

[提 要]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爆發前後，中國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以報刊輿論為陣地，引導和推動國民參與外交。針對西方媒體誣稱中國民眾“仇美”(Anti-America)之事，國內輿論界人士針鋒相對，大力倡導“文明抵制”，旨在“使外國知吾國民之並非可侮”，並借助報刊輿論，監督清政府外交，旨在“勿令政府復施其辱國外交之手段”。隨著各地報刊雨後春筍般湧現，一場聲勢浩大的輿論風潮逐漸形成。正當中外輿論角力愈演愈烈之時，清政府卻迫於美方壓力，對抵制美貨運動強行鎮壓，這驅使國民不得不深入思考何為“外交之本體”問題，由此彰顯“國民”在對外交涉中的“本體”地位。可以說，抵制美貨運動前後輿論風潮迭起背景下國民外交與清政府外交之間的糾葛，反映了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驅動下國民對政府認同與否的態度，折射出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遷。

[關鍵詞] 抵制美貨運動 輿論風潮 文明排外 國民外交

[中圖分類號] K25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2-0182-12

近代中國日益發達的報刊輿論，往往在一些重大突發事件中扮演催化劑作用，引發內外政策的演變、知識體系的重構，乃至社會思想的變遷。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爆發前後，以《時報》主筆陳冷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適時介入，他們利用報刊輿論引導國內民眾參與外交，有力推動抵制美貨運動的醞釀與發起。針對西方媒體誣稱中國民眾“仇美”(Anti-America)之事，國內輿論界人士針鋒相對，對內以強有力的輿論“監督我政府，勿令政府覆施其辱國外交之手段”；對外則倡導“文明抵制”，“使外國知吾國民之並非可侮”。隨著各地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一場聲勢浩大的輿論風潮逐漸形成，這與美方干預以及清政府壓制形成了針鋒相對之勢。而在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驅動下，輿論角力與外交糾葛愈演愈烈，清政府與國民在對外交涉中的“本體”地位由此發生轉換，“外交之本體實在國民”遂成為國民外交的新口號。

學界既往對抵制美貨運動前後的中外交涉作了詳細考察，關注焦點在於清政府與美國政府官方層面的交涉，以及商人團體的對外行動，尚未注意輿論層面的中外博弈與社會互動，尤其是輿論風潮的形成過程及其對外(美、歐等國)、對上(清政府)、對下(下層民眾)重要影響等問題。<sup>①</sup>本文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置於報刊輿論關照視野之中，系統梳理輿論角力與外交糾葛既並行不悖又

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旨在釐清輿論風潮的形成脈絡與背後原因，並以國民外交思想深層變動為例，一窺抵制美貨運動背後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遷。

## 一、報刊評論與抵制美貨之倡議

早在 1903 年美國禁止華工條約十年續約期滿之際，海外華人就對美國禁止華工入境問題表達關切和擔憂，認為此事與中國“外交”關係甚大，並指責美國長期以條約形式限制華人入境之不當。1904 年，旅美華僑向清政府外務部請求無果後，遂將視線轉向國內民眾。他們以美國華僑報刊為平台，向民眾廣泛呼籲：欲廢除美約，“除了抵制美貨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一些旅美華僑亦陸續回國，籌劃開展抵制運動。在旅美華僑的呼籲和發動下，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民眾紛紛響應，相繼成立拒約機構，逐漸“形成了全國性的反美愛國主義運動”。<sup>②</sup>

國內商界人士首先起來響應。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各幫商董因美禁華工問題召開商務總會，集議抵制美貨之策。上海商務總會曾鑄主持會議並發表演說稱：“美如必立續約，我商人當相戒不辦美貨，以為抵制。”會議決定由曾鑄領銜致電清政府外務部，宣稱抵制美貨之舉，“事關國體民生”，籲請外務部採取必要行動，“以伸國權而保商利”。<sup>③</sup>同時，與會者向全國各省商會廣發電文，呼籲各地商界人士同心協力，共謀抵制。

此次集會上，與會者以“保商利”、“伸國權”相號召，引起國內報刊媒體的強烈反響。集會當天，《時報》便刊發評論稱：上海紳商集議之舉，一掃先前“中國人無國家思想”之觀感，民眾視抵制美約為關係“國權及國體之大問題”，因此不可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若“全國人聞風繼起，合大群而共謀抵制之策，使吾政府知有輿論以為之聲援，而又使外國知吾國民之並非可侮，則於中國外交之前途，其或不至於長此失敗也。”<sup>④</sup>《申報》的時論則指出，中國在美經商從業者甚多，此事不僅牽涉外交，而且與國家利權大有關係，故抵制美貨事宜，“吾國民所當出全力以爭之者也”。<sup>⑤</sup>顯然，當時輿論界人士將抵制美貨之舉，視為關係中國“國權”與“國體”的大事，呼籲國民參與外交時能夠“合大群”，以實現“伸國權”和“保商利”的目標。

5 月 12 日，旅滬廣東紳商在廣肇公所商議抵制美貨事。與會者重申“合大群以實行抵制”的重要意義，並擬定“合群力拒”美約的辦法三項。<sup>⑥</sup>《中外日報》在追蹤報導上海民眾集議時注意到，與會者向“廣東各大善堂”致電，積極聯絡和發動慈善界人士加入到抵制行列。《時報》則對當時上海紳、商、學界動向予以密切關注。該報刊發評論稱：14 日，旅滬福建紳商在泉漳會館集議時，曾鑄向與會者提出“二個月後一律不賣美貨，重言聲明抵制之法”。上海公忠演說會數百人亦於當天舉行集會，“先後演說者凡十餘人，約歷四點鐘之久始行散會，其所議抵制辦法仍主不用美貨，擬將美貨各種名式調查佈告，以便購取者辨別，且擬電告美國工商部，申明華人斷不承認此約。”<sup>⑦</sup>16 日，上海人鏡學社集議抵制美貨，標誌著學界已正式加入抵制隊伍。

與此同時，上海商務總會在曾鑄等人的倡議下，向全國商、學、工界人士廣致函電，呼籲各界人士“合大群”，共同實行文明抵制美約行動。上海商務總會的倡議得到各方人士的廣泛支持，大家紛紛覆電表示：“此係國民合群”的大好時機，應當“禁野蠻暴動”，而採取“文明辦法”，各地民眾要“始終謹慎堅持，以免外人益鄙夷我。”<sup>⑧</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倡導“合大群”、“謀抵制”以“伸國權”之時，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士紳在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驅使下，以報刊輿論為陣地，以文明抵制為宗旨，引導民眾參與外交。一方面，他們注意到倡議抵制美貨運動以來高漲的“民氣”，對其進行合理地宣揚和引導。5 月 17 日，《申報》

刊發題為《論中國民氣有發達之機》的時評稱：“國勢之強咸在於民心之固結，民心之固結在於民智之開通，民智之開通在於民氣之發達。”民氣之強弱關乎一國之盛衰，故對於抵制美貨之事，我國民“非結合群力無以禦強”，“非急起競爭無以挽危局”。若舉國上下能群策群力、團結禦侮，則“民氣於以發揚，而國體於以固結”。更重要的是，能使我國擺脫任由列強欺侮的局面，使外人“知政府可欺而吾民不可欺，政府可誘而吾民不可誘，政府可脅而吾民不可脅。”<sup>⑨</sup>18日，《中外日報》亦刊載評論表示：此次商學會、廣肇公所、福建會館相繼倡議抵制美貨，雖然將來能取得何種效果尚未可知，但此舉必能使我國民“漸知警醒”，起而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共同努力。<sup>⑩</sup>

另一方面，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借助報刊輿論，對清政府外交政策的軟弱進行無情地批判，並大力倡導民眾文明抵制美貨。5月18日，蔣智由從國家、政府與人民三者的關係入手，對清政府與美國訂立禁止華工條約之舉進行了嚴厲批評，稱國民與國家是一個“有機體之關聯”，換言之，政府為國民之機關，代表了國民的意志和利益。然而，清政府迫於美方壓力，簽訂美禁華工條約，此舉顯然違背了國民的意願，當前清政府不能代表國民的意志，“吾民不能不起而自抵美約。”<sup>⑪</sup>《新聞報》社論毫不留情地指出清政府“外交力量之薄弱”，聲稱儘管與美方進行反復“磋商”，卻遲遲未果，以致今日國民不得已而“自為抵制”。該報注意到數日來上海各界“合大群”、“謀抵制”之舉，稱讚“中國人尚知合群”，認為“合群之力之足以有為”，一方面可以“扶助外交官吏之勢力”，另一方面能使美歐各國列強知我國民“能為文明之合群”。<sup>⑫</sup>

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倡議階段，中國知識階層有意識地向下層民眾宣揚“合大群”、“結團體”和“文明對待”等文明排外的思想理念，從而使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逐漸深入人心。事實上，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的背景下，民眾提倡“合群”和“文明”對待是有其深刻的歷史經驗及教訓的。尤其是對戊戌和庚子時期中國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的相互分離狀況的不斷反思，使中國知識階層和先進分子逐漸認識到下層民眾力量的強大，於是向他們發出參與外交鬥爭的呼聲。因此，可以說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的結合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物，同時又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

受美國華工禁約的強烈刺激，全國商、學、工、慈善界人士紛紛組織團體，加入到抵制美貨運動之中，抵制聲浪也日益高漲，這無疑給包括駐上海使館的美國政府當局造成一定觸動。為了緩和中國民眾的情緒，5月21日，美國新任駐上海總領事勞治師邀約上海商務總會代表嚴厚信、曾鑄、蘇葆笙等八人進行面談，美國新任駐華公使柔克義也來到商談現場。在當天的會談中，美方表示，“一旦不用美貨，於兩國交情或有關礙”，並藉口改定新約要等到6個月後下議院召開之時，要求上海紳商停止抵制美貨。對此，曾鑄當場予以拒絕，蘇葆笙亦態度堅決地表示：“貴國一日不定約，即華人一日不定心”，則抵制美貨運動一日不停止。<sup>⑬</sup>

而在上海商務總會代表與美方會談的當天，上海滬學會召開大會，會長馬相伯當場“贊成不用美貨之說”，並提出“勸學界同人到處演說禁約細情”和“刊印禁約細情到處分送”兩項建議。次日，上海商務總會再次集議，曾鑄在會上痛斥清政府“與外國交涉均不令民間與知”，呼籲民眾對於中美禁約交涉一事，“必須向此層留意，設法預為防備。”戈朋雲亦在演說中大力鼓舞民眾“堅持初議，眾志成城，萬勿虎頭蛇尾，使外人此後愈輕吾國”。<sup>⑭</sup>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民眾在倡議和發起抵制美貨運動之時，有意識地將“合大群”、“結團體”和“保利權”三者視為息息相關的整體，旨在“喚醒國民合大群結團體，以禦外侮而保利權。”《申報》一篇題為《自強必先自治說》的時論表示：國民欲禦外侮而圖自強，必須要“合大群結團體”，舉國上

下眾志成城，才能避免“參錯不齊之患而合為一”，全體國民萬眾一心，才能避免“渙散隔膜之病而結為一體”。<sup>⑮</sup>

誠然，如何將下層民眾廣泛地聯結起來，喚起他們的“國家思想”與“國民意識”至關重要。對此，《時報》主筆陳冷認為，我國民向來無“國家思想”，近年來外患日迫，“我國民之國家思想日漸發達”，面對列強的欺侮，國民不再忍氣吞聲，而是通過參與對外交涉，實施文明抵制之舉。特別是抵制美貨運動發端以來，國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不斷萌發，他們已然知曉“國家與我有密切之關係”，明白外交之成敗，關乎國家利權、國民利益，意識到參與外交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可能引發國際爭端，因此注意採取文明抵制之舉。<sup>⑯</sup>而在《籌議拒美約議》一文中，陳冷借鑑西方議院政治思想，進一步提出“國民合一”之說，並強調“國與民合，則內政外交無往而不利，國與民分，則內政外交無往而不敗。”<sup>⑰</sup>可見，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倡議和發起之時，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已經主動地與下層民眾聯結起來。對此，時任中國駐朝鮮公使曾廣銓在寫給《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信中，不無稱讚地表示：抵制美貨運動發起以來，“我國人民目前似乎在各個方面保持警惕。我注意到抵制美國的運動，……最後喚醒了中國各省的人們。”<sup>⑱</sup>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知識階層與趨勢新人士在引導下層民眾參與外交之時，有意識地從“國民”與“國家”的二元關係中，提煉出“民氣”這一當時社會所特有的詞彙。對此，陳冷撰寫題為《論民氣與國家之關係》的社論稱：“民氣強者國家強”，“國家之不可侮，非國家之不可侮也，民氣不可侮。國家之不可滅，非國家之不可滅也，民氣不可滅。”<sup>⑲</sup>此外一篇題為《論中國人民之可用》的時論指出：中國國民過去“無國家思想，並不知吾身與國有切膚之關係”，自從國民受外界刺激後倡言排外，然而民氣雖強，卻容易演變成無意識的暴亂，義和團的野蠻排外即是其中一例。<sup>⑳</sup>當時，國內民眾共同謀劃抵制美貨，美國卻仍然有恃無恐，其根本原因在於“清政府弱也，為彼所不畏，我民氣又素弱也，亦為彼所不畏，然民氣始於弱而終於不弱，其轉移全在於我同胞耳。”<sup>㉑</sup>因此，可以說，“今日對付此禁約之問題，在有一最要之解決，解決何在？則曰勿依賴清政府，而專恃民氣是也。”<sup>㉒</sup>

如前所述，上海商務總會的集會和倡議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從5月10日上海商務總會集會倡議兩個月後不用美貨起，到7月10日正式實行抵制美貨，短短數月間，各地以紳商學界為主體的集會紛紛召開，這一情況表明中國社會在經歷重大分化組合的變動之時，民眾的“國家思想”和“國民意識”進一步萌發。與此相適應，各界社團或組織的產生和聯合，亦是民眾“合大群”、“結團體”的現實需要和必然結果。

顯然，當時各界團體一致強調“合群”的重要性，並將維護“利權”作為重要目的。而在中國內憂外患的時局下，個人或單個組織的力量不足以抵禦外侮，因此民眾強調“合群”是非常必要的。對此，《申報》評論稱：當今世界乃一競爭世界，他國“合群力以圖吾，吾亦必合群力以抵制之”，對於抵制美禁華工一事，中國“商會之力居大部分，是可見其效矣，學會者學界上合群之基礎也，商會者商界上合群之基礎也，基礎改立則事業乃可以有成耳。”<sup>㉓</sup>

隨著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不斷萌發，國家思想、利權意識等逐漸深入人心，其中報刊輿論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特別是“二十世紀國度強弱，視其報館多少為強弱，視其國報紙銷數多少為強弱，視其國國民能閱報紙多少為強弱”，故一大批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在各地廣設講報所，努力提高廣大民眾的主權意識，如此方能使中下層社會真正實現“合群”，共同參與到抵制美約的外交鬥爭。<sup>㉔</sup>

在美約的逼迫下，時人還通過報刊輿論大力呼籲民眾對清政府外交進行監督。在謀劃抵制美

貨運動之時,《外交報》刊發時論稱,外交成敗,事關國家興亡,“然而外交官之主力,則不在於外交官,而在於全國家”,故全體國民應當以強有力之行動,監督清政府外交。<sup>55</sup>《時報》主筆陳冷亦呼籲:“我華民數百萬人一心,數萬萬人一心,以監督我政府,勿令政府覆施其辱國外交之手段,以賣我數十百萬華旅之生命財產於外人也”。<sup>56</sup>顯然,在對清政府外交表示強烈不滿的同時,民眾表露出直接參與外交的意願。儘管此時他們的言論尚屬克制,所表現出來的參與外交意識還比較模糊,尤其是對“文明排外”觀念的理解並不深刻,但抵制美貨運動正式實行以後,這一狀況逐漸改觀。

## 二、輿論風潮與“文明抵制”之倡導

早在美禁華工十年續約到期之時,中國民眾就因條約迫使“華民身受之虐如此其殘酷,受虐之事如此其眾多”,對美國“自負為文明之國,共和之政治”予以質疑和駁詰。<sup>57</sup>尤其是中國知識人士,目睹民眾排外運動常常演成無意識的暴亂,深知此為我國“外交失敗之由,而亦我國人不文明、不富強”的根本原因。<sup>58</sup>為此,在倡議和發起抵制美貨之時,他們以“文明之辦法”相號召,教育和啟迪下層民眾“能為文明之合群”。<sup>59</sup>既以“文明之辦法”相對待,則“我民當急講自新之道,我國當急求自立之原”,並且“抵制禁約當以平和之競爭,效文明之成例,不可激起排外之暴動”。<sup>60</sup>

那麼,何為文明國家的“排外主義”?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國民應當採取何種“排外方法”?對此,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已經認識到“中國之危,危於外交”,特別是“庚子排外之舉,其為我國存亡之大界乎,而求其所以致禍之故,則不由於排外主義之非,而由於排外方法之謬。”<sup>61</sup>因此,文明抵制美貨之關鍵在於抵制得法,“其所以抵抗之法,其大要一端只在不購美貨。其舉動似甚暴烈,而其範圍實甚緊嚴,既不傷中美兩國之交情,並不礙在華美人之生命。”可以說,民眾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倡議階段如此強調文明對待,這在以往的排外運動中是難得一見的,難怪時人喊出了“此為我中國第一次文明舉動”的口號。<sup>62</sup>

在發起文明抵制美貨倡議的過程中,報刊輿論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6月11日,天津《大公報》宣佈拒絕刊登美商廣告,其《告白》稱:本報刊登美商廣告,即為美商招攬生意。為此決定,從即日起,“所有關涉美人的告白,一概不登”,以示抵制。<sup>63</sup>天津《大公報》以不登廣告之舉,表達對抵制美貨運動的支持,無疑為推動輿論界參與排外做了表率。然而,在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相互聯結、共倡文明抵制之時,國外輿論對民眾的文明抵制行動卻作了大量的負面報導,尤其是英美報刊對此抱以敵視態度。與此同時,美國駐廈門領事喬治·安德森(George E. Anderson)致電美國國務卿法蘭西斯·路米斯(Francis B. Loomis)以及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誣稱“中國人的反美情緒日益高漲,敵視美國人的現象無時無刻不存在”。<sup>64</sup>

6月17日,柔克義向時任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遞送《大公報》一張,宣稱該報“新聞內傳單與貼帖告白不用美貨,以激動人抵敵美國”,要求將其查封。對此奕劻竟然表示,“此係糊塗人不知實在情形所為者”,並稱定必設法禁止。<sup>65</sup>不僅如此,英國《益聞西報》還將中國民眾倡議抵制美貨之舉視為“仇美”,並對其進行了大量的負面宣傳和報導,在國內外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為此,天津《大公報》發表評論進行反駁,稱:“貴報每紀載此事,則加以 Anti-America(譯言仇美)之字樣,倘輾轉相傳,致使美人誤會其意,而以為今日士商文明之舉動猶是當年拳匪蠻野之行為”,此事關係中國國際形象,故“不得不與貴報辨明之。”<sup>66</sup>可見,儘管面對來自清政府和外國列強的雙重壓力,但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借助輿論宣傳的力量,對民眾的文明抵制美貨行動予以大力支持。

從7月10日起,抵制美貨運動由發起倡議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在此前後,就國民外交的表現

及其特徵而言,如果說在運動發起倡議階段,主要表現為以“合大群”、“結團體”為特徵,以“保利權”為目的的中國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的溝通與結合;那麼在運動進入實行階段後,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以報刊輿論為陣地,大力倡導“文明排外”,從而使國民外交的思想和行動賦予了“文明排外”的新內涵。

對美貨實行全面地抵制並達到廢除美禁華約的目的,需要廣泛地團結和發動包括下層民眾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但由於下層民眾缺乏文明排外的知識和經驗,容易將文明抵制演變成盲目排外或無意識的暴亂,因此,教育和引導下層民眾參與外交,就顯得尤為重要。7月10日,即國民正式宣佈實行抵制美貨的當天,天津《大公報》刊發《北京學界同志敬告全國學生文》,提出文明抵制美貨之舉,“我國民對外權利思想之進步,以此次為第一先聲”,全體國民“一當明對乎一己之責任”,“二當明對乎國家之責任”,“三當明對乎社會之責任以實行抵制法。”<sup>⑧</sup>而在兩天後的續文中,該報鑑於“國民於對外之思想向稱薄弱”,且中國“上中等社會人數較少而識見較開通,下等社會人數較多而識見較易蒙蔽”的狀況,遂提出聯結和發動下層民眾,並引導他們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示以和平辦法,勿失之激烈”,以實現文明抵制。<sup>⑨</sup>

在推動下層社會民眾文明排外的過程中,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利用報刊輿論積極發動,大力引導。他們以宣揚“文明排外”為宗旨,將抵制美貨運動視為發展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手段,並認為較之以往的國民外交行動,此次運動“合一國之群力而謀一國之公益”,尤其是國民能夠“結種種之社會,籌種種之方法”,儘管他們絕大多數人未曾赴美或出國,但對於此事能齊心協力、互相聲援,顯然這是我國“由個人主義、家族主義漸進而為民族主義之明證也”。既然已經是“民族主義”國家,其國民自然成為文明之國民,那麼,在參與外交鬥爭時,國民更應當“為文明之競爭,為文明之排外,而不燒教堂,不殺教士,不學義和團為野蠻暴動、為野蠻之排外”。<sup>⑩</sup>

誠然,中國知識人士在向下層民眾進行“文明排外”思想和知識的灌輸時,報刊輿論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這些報刊媒體,除了前面提到的《申報》、《時報》、《新聞報》、《中外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等各大報紙之外,一些旨在宣傳和鼓動民眾文明抵制美貨的專題宣傳物亦開始出現。其中影響較大者,有梁啟超主編的《華工禁約記》(又名《美國華工禁約記》)、孟秋月主編的《廣勸抵制美約說》、黃晦聞創辦的《拒約報》、蘇紹柄主編的《山鐘集》,以及上海民任社發行的《中國抵制禁約記》、上海平等社發行的《美國華工禁約紀事》(初編、二編)、上海啟智書局出版的《拒約奇譚》(小說)等。

上述報刊讀物中,《拒約報》編纂宗旨及發行理念,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國民“文明排外”思想的萌發。該報總編輯黃晦聞鑑於內憂外患的時局,以及清政府外交人員“節節退讓”的事實,感慨“國權之不足與外交爭也,於是鼓民氣以爭之,民氣恐其餒也,於是辦拒約報以提倡而鼓舞之。”<sup>⑪</sup>1905年8月21日,《拒約報》正式發行,其《祝詞》宣稱:“偉哉此報,命名拒約,輿論轟轟,民氣磅礴”。該報一經發行,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購者極為踴躍。第一期一下子就買光了,第二期要先行預約才能買到。”民眾如此喜愛閱讀此報,其重要原因是該報反映了他們自願抵制美貨的訴求,由此“可見拒約運動已深入社會各階層,發生了一定的作用”。<sup>⑫</sup>

而由民任社編輯出版的《中國抵制禁約記》,旨在將“各埠實行之實情,暨國民之意趣,暨中外之輿論,而以其效驗之希望,藉鼓國民之氣”。該書《弁言》更是旗幟鮮明地表示:雖然外人誣稱中國為無國民之國,其實“無國無民非無國無民也,無人心也。乃吾國今年以美國禁虐華工之事而有全國抵制之舉,登高一呼,全國響應,雖鄉僻婦豎亦莫不舉手大呼曰:抵制!抵制!以實行其文明抵

制之法”，此足可證明“中國之民心未滅，文明未絕也”。<sup>42</sup>可見，在對文明抵制美貨的號召和鼓動中，時人已經注意到了輿論宣傳的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大量專門性讀物的發行，一方面表明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不斷萌發的背景下，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已經找到與下層民眾進行溝通和聯結的途徑；另一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國民參與外交時主體意識、社會心理以及民族情感的提高和昇華。對此，《時報》亦不無讚歎地表示：在輿論界的大力推動下，全體國民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堅持“文明排外”，以“民力行用於外競”，此實為我國輿論援助外交之“嚆矢”。<sup>43</sup>

民眾通過文明抵制美貨實現文明排外，這無疑是內憂外患時局下中國“國民外交”發展和形成的特殊歷史現象。顯然，他們在運動中強調“文明抵制”之時，抵制辦法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在運動發起之初，民眾對諸如何時實行抵制、採取何種“文明辦法”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其中對於“不定美貨”抑或“不買賣美貨”問題，社會各界的爭論尤為激烈。

7月19日，上海滬學會聯合學界、商界和工界人士召開特別大會，“公議實行不用美貨辦法”，馬相伯在會上盛讚“今因外患相迫，學界、商界遂能聯絡一氣”，並向與會人士提議“共籌處置美貨存貨之善後辦法”。<sup>44</sup>這一提議立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隨著報刊媒體的傳播以及人們口頭相傳，更是引發了民眾對何謂“文明之辦法”等問題的熱烈議論。雖然“抵制工約之事，實為文明之舉動”，民眾在運動中能夠聯結起來、共謀抵制，“民氣如此，實足以補政府權力之不足，以是為外交之後盾可也，亦足以見國民之能盡義務”，但由於下層民眾的“文明排外”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對國民在運動中“不定美貨”抑或“不買賣美貨”問題，並沒有清醒的認識。<sup>45</sup>而這一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將直接關係到文明抵制能否被真正實施，以及廢除美禁華工條約的目標能否得到實現，故引起了當時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論爭。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社會各界對此有兩種明顯不同的觀點。由汪康年等人主辦的《中外日報》認為，應當以不定美貨為抵制工約“獨一無二之政策”。<sup>46</sup>馬相伯對此持相同意見，稱“專主不購美貨之議，則非杜絕美貨而為杜絕華貨，又非苦待美商而為苦待華商”。<sup>47</sup>故馬相伯還大力倡導“疏通定貨說”，即“主張七月初十前在美國報關未經出口之貨物一律退回，已存美貨經商會以及各幫商董調查後，貼上印花上市銷售。”贊成此舉的還有張謇等人。8月下旬，張謇抵滬“與湯壽潛、汪康年等協商‘疏通’辦法，議決設立驗貨公所，公銷六月十八日前所存美貨”，28日，他還委託汪康年和張元濟等人“負責疏通美貨商品”。然而，此舉“引起上海有些團體反對”，商學兩界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尤為明顯。如何應對和解決這一分歧，不但關係到社會各界的團結，而且對於抵制運動能否有效開展而言，至關重要。<sup>48</sup>

事實上，隨著抵制美貨運動的逐步開展，由於商學兩界在運動中始終以“合群”相號召，加之張謇、張元濟、汪康年等人“聯合商會學會及各學堂會議”，“兩面調停”，化解矛盾，使得“已定美貨既可自由銷售，而又於團體無礙”。<sup>49</sup>由此可見，在國民參與抵制美貨的外交鬥爭中，知識階層和趨新士紳不僅是文明抵制的倡導者，同時還為化解矛盾、解決分歧以及增進團結等做了巨大努力，從而為文明排外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動和聯合各界人士文明排外的過程中，各地出現了諸如“文明拒約會”之類的社會團體，這些團體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表明國民合群意識的進步，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溝通和聯繫的加強，同時也為保證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獲得成功奠定了基礎。在諸多社會團體中，1905年7月成立的廣東拒約會尤其引人注目。該會自成立之日起，便制定了詳細的抵制辦法，並



通過“將美貨商標繪圖張貼”和“派員到處演說”等措施，大力動員民眾“文明排外”。<sup>50</sup>在實際運動中，該會由專人組織，有固定的開會場所，並以“普勸國民不用美貨，抵制美約為宗旨”。<sup>51</sup>顯然，廣東拒約會的成立，使國民外交行動“較前已有進步”，難怪時人甚至喊出了“廣東拒約會萬歲！”的響亮口號。

需要補充的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拒約會等社會團體的集會演說，還是商界、學界以及輿論界的宣傳鼓動，均將排外運動定位於監督和援助政府外交的地位，旨在督促政府在外交中以國家利權為重。<sup>52</sup>然而，事實上，當時運動的發起者本來相當一部分已抱反對清政府的立場，為了方便其行動，他們暫時將自身立於外交從屬地位。隨著抵制美貨運動的深入開展，“國民外交”很快由“從屬”地位向“本體”地位轉換，中國“國民外交”的思想與理念由此產生新的變動。

### 三、外交糾葛與社會思想之變遷

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倡議發起之時，發動者大多為各省旅居上海的知識人士和紳商階層，他們充當了運動的主導力量；而隨後加入到抵制隊伍的學界和輿論界人士，則通過集會、演說和報刊輿論等手段，成為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圍繞抵制美貨運動，國民重新審視清政府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他們自身在外交鬥爭中的角色和地位也有了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各階層民眾不斷加強溝通和協調，並通過組織成立各類團體，共同參與到文明抵制美貨運動之中，從而對國民外交的思想和理念做了新的詮釋和演繹。

在時人看來，“此次抵制純以國民私人之資格，與國際上絲毫無與也”，況且“人民欲購何國之貨，不欲購何國之貨，全屬其意志之自由，非直不能以國際條約束縛之，即國內法亦無所容其干涉之餘地”。<sup>53</sup>然而，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卻遭到美國的無理干涉以及清政府官員的大肆壓制。尤其是直隸總督袁世凱，自始即對民眾的抵制美貨運動採取敵視態度，甚至公然宣稱將對抵制之人“從嚴查究”。<sup>54</sup>

值得一提的是，在抵制美貨運動中一直較為活躍的張謇等人，曾致函袁世凱，告以“美禁華工，非常虐待；夙自美歸者皆如此言。華人同聲抵制，遍各行省”，“此等國民知識，文明競爭，五年之前所不敢望。幸而有之，是宜養成，以收贊助政府之效。”故婉勸袁氏放棄“禁華人不用美貨之議”。<sup>55</sup>然而袁氏並未接受張謇等人的勸告，仍然對包括天津商會等團體的活動厲行鎮壓，並向天津《大公報》施壓，由此激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

1905年5月4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刊文憤怒地表示：當此中國民氣大振之時，我國正應“利用此力以為政府之後援”，然而“袁氏此舉，吾不知何意也，謂其必欲媚美人而損我國體、蔑我人格以為快，苟非喪心病狂，斷不至是。”<sup>56</sup>23日，《申報》亦發文宣稱：“熱心志士惕於亡國之悲，迫於滅種之慘，不憚大聲疾呼，喚醒國民合大群、結團體，以禦外侮而保利權”，然而，反觀清政府，“其於內政也，則無論若何重大事件，一紙空文即可塞責”，“其於外交也，則畏葸退讓，懼洋如虎，先事無預防之法，臨時無抵禦之策，一任外人之誅求要素而莫敢枝梧，國勢之積弱如此，其不足恃也可知矣。”<sup>57</sup>

面對社會各界強烈不滿的情緒，袁世凱卻仍然堅持原議，認為抵制美貨運動“於目前中美邦交殊多窒礙”，故要求天津商會自行解散。隨後袁氏還上奏清廷，要求將各省的抵制活動一律取締。<sup>58</sup>對此，《新聞報》在28日的時論中憤怒地表示：“袁宮保因國民合群抵制美國禁約”而大加干涉，“中國國民方力持於下以冀得達目的，而中國官場忽干預於上欲使全國解體”，此足以證明“中國政府



不足依賴，全在商民合群力爭”。<sup>59</sup>天津商會作為抵制美貨運動的中堅力量，卻遭到清政府的強行解散，對此天津《大公報》痛徹指出：自從倡導抵制美約以來，“國民團體結合日漸膨脹”，上海各界“文明抵制”聲起，各地民眾應聲而動，“其聲勢之雄，其風潮之大，實為我中國數千年來第一次文明之舉動。”若此時清政府借助國民支持與美方交涉，則我國“外交界上當可間接而得其後援，以增益外交家之威力，殆必然之勢也。”然而，儘管國民外交爭之於下，清政府外交卻失之於上，此種情形實在令人痛惜。<sup>60</sup>

顯然，在對清政府內外政策的無情批判中，時人開始對政府與國民在外交中的地位予以重新審視。1905年5月23日，《時報》在《論抵制美國華工禁約》一文中稱：我國長期以來，“一切內治外交，無不政府獨專其事”，當此內憂外患之時，雖然“我國民萬眾一心，有此強硬之民力，足為政府之後盾”，但“此次爭約不徒倚賴官力，而能行用自力。”<sup>61</sup>如果說當時國民開始質疑清政府在外交中的主體地位，那麼隨著抵制美貨運動的急速發展，到6月2日，這一情況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是日，該報刊登《敬告會議對付美約之諸君》一文，直接提出抵制美貨運動之根本目的在於“勿倚賴清政府，而專恃民氣是也”。<sup>62</sup>

隨著抵制美貨運動日益向縱深發展，時人還通過集會、演說等形式，對清政府在外交中的權威性和代表性不斷予以否定，並借此鼓動國民參與外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7月6日，《有所謂報》記者將不依賴政府納入“文明排外”範疇，提出“排外必有策”，“今民智日開，民族主義日漸發達”，故美禁華工條約問題，“不必觀望滿清外務部之磋商，不必倚賴地方官吏之協助”，而應當倚重國民外交。<sup>63</sup>嶺東同文學堂教習溫丹銘在抵制美貨大會上發表演說時亦稱，中美此次交涉乃“國民全體之交涉，非個人之交涉，彼虐我華僑，即辱我全國”，以往中國外交喪權失利均“由於倚賴政府與官場之故”，因此抵制美貨之事，國民須直接進行，以文明抵制美貨之舉，表達國民外交訴求，而“不必倚賴政府，且必絕政府干涉而後可”。<sup>64</sup>

7月10日，隨著全國各地紛紛宣佈抵制美貨，民眾的“文明排外”訴求和理念進一步得以凸顯。從這時起，國民已逐漸認識到“抵制美約，為虐待華工起見，是民族上切膚之害，非政府中切膚之害，當由國民擴張其特別權”，為此，國民在運動中以“文明之辦法”相互激勵和勸勉。<sup>65</sup>由於普通民眾缺乏參與外交的知識，尤其是缺少國民外交的思想內核，故需對其加以教育和引導。這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在對外交涉中的引導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清政府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實行對外屈辱、對內嚴厲壓制的政策，激起了包括知識人士在內的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8月3日，外務部在致函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時稱，為顧全中美邦交，清政府已向各督撫下令，對抵制美貨之人將以武力手段進行“彈壓”。<sup>66</sup>對此，由張元濟等人主辦的《外交報》於8月5日刊發《論抵制美約》一文。在談及抵制美貨運動前後的國民參與外交問題時，該文重點探討了政府應如何加以對待的問題，其觀點十分明確，即認為國民“以文明之舉動行補救之微權，此實為我國通商以來之第一次”，對於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政府不但不能干涉，而且應當加以利用和引導，以彌補政府外交之不足。<sup>67</sup>

然而，國民的抵制美貨行動不但未能得到清政府的認可，反而遭到清政府和美方的雙重壓制。9月1日，清政府在收到御史王步瀛“各省工商抵制美約風潮過激，飭加意防範以維大局”一摺後，電諭各省督撫稱：抵制美貨“有礙邦交”，故“責成該省督撫等認真勸諭，隨時稽查”。<sup>68</sup>同時，美方亦對此保持高度戒備，其駐廣州領事甚至以“防止暴力騷動可能發生”為藉口，“建議美國船Monadnock號到往保護”。<sup>69</sup>面對如此險惡的情況，時人意識到，欲使抵制運動長期、有效地開展下

去,就必須廣泛發動各界民眾參與進來,形成抵制美貨的巨大聲浪。鑑於“吾國上中社會之人,雖心智較廣,而素無國民教育、社會觀念”,而下流社會又缺乏參與外交的知識和能力,加之“吾上中社會人少,而下流社會人多”的現狀,因此,必須不斷地發動和引導下流社會參與外交,以此來鍛煉和提高國民參與外交的能力。<sup>①</sup>

基於上述目的,中國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不斷將日本國民外交思想引介給國人。1905年10月8日,《大陸》以《對外政策概論》為題,選譯並刊載了日本政治學者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學大綱》,稱:“對外政策之原動力,在乎國民”,“外交最終之監督,仍在乎國民”,因此政府在外交中應當以國民為後盾。與此同時,還要“使國民輿論與對外方針適相一致,又當局者以強大之國論為後援,庶可期外交之成功。”<sup>②</sup>

應當指出的是,日本小野氏認為“國民”在外交中應當監督和援助政府,以政府外交為主體,國民外交為政府外交的後援。然而,這與中國“國之本在民,保國最要之大端在於其民之有愛國心”等情況相比,似有較大差異。<sup>③</sup>1905年底,中國國民抵制美貨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抵制美約之聲已為國民公認,雖抵制之法未可謂完全乎,而不定美貨、自興工業之論議與事實,固足以代表其抵制之實心”。在此情形下,《外交報》刊發《論民氣之關係於外交》,明確提出“外交之本體實在國民”。文章稱:“積民而成國,國有外交,即國民與國民之交涉也。國民不能人人自立於外交之沖,於是有外交當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權之利害,即國民之利害也,所執之政策,亦國民之政策也。”在抵制美貨運動中,中國社會各階層群相參與,“國民漸涉歷於外交界,則亦以此為端倪矣。”<sup>④</sup>顯然,“外交之本體實在國民”這一口號與日本國民外交思想相比,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即對政府與國民在外交中的主從次序進行了反轉。

總之,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外交鬥爭中,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一方面通過倡導“合大群”、“結團體”等理念,使中國國民參與外交的意識和能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同時還對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進行了合理地引導。隨著運動不斷地深入開展,由於清政府在外交中將國民置於對立面加以禁止和壓制,這引發了時人對國民和政府在外交中主從地位的激烈議論。而在一系列議論和反思中,國民對清政府在外交中的主體地位不斷加以否定,與此同時,國民在外交中的“本體”地位日益凸顯,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驅動下國民對政府認同與否的態度,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遷。

①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朱英:《清末商會與抵制美貨運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6期;金希教:《抵制美貨運動時期中國民眾的“近代性”》,北京:《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立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抵制美貨運動》,北京:《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賈中福:《近代國民外交視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貴陽:《貴州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許冠亭:《商會在官、民、洋三元互動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約交涉

及抵制美貨運動為例》,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黃賢強:《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②④⑤丁又:《1905年廣東反美運動》,《近代史資料》(總22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

③《記上海紳商會議事》,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5月11日。

④《時事批評》,上海:《時報》,1905年5月10日。

⑤《論美禁華工新約》,上海:《申報》,1905年5月10日。

- ⑥《各幫紳商聚議對付美約事》，上海：《時報》，1905年5月13日。
- ⑦《美國華工禁約問題》，上海：《時報》，1905年5月15日。
- ⑧蘇紹柄編：《山鐘集》，上海：1906年油印本，第15~16、21頁。
- ⑨《論中國民氣有發達之機》，上海：《申報》，1905年5月17日。
- ⑩《續論滬上紳商集議美約事》，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5月18日。
- ⑪觀雲：《對外之舉動，對內之舉動》，日本橫濱：《新民叢報》，第69號（1905年5月18日）。
- ⑫⑲《論華商可與美領事協商》，上海：《新聞報》，1905年5月20日。
- ⑬《記美領事與上海商董會議事》，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5月22日。
- ⑭《美國華工禁約問題》，上海：《時報》，1905年5月22日。
- ⑮⑤⑦《自強必先自治說》，上海：《申報》，1905年5月23日。
- ⑯④③①《論抵制美國華工禁約》，上海：《時報》，1905年5月23日。
- ⑰《籌議拒美約議》，上海：《時報》，1905年5月29日。
- ⑱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卷（1895-1912），劉桂梁等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383頁。
- ⑲《論民氣與國家之關係》，上海：《時報》，1905年5月29日。
- ⑳《論中國人民之可用》，天津：《大公報》，1905年5月30日。
- ㉑②②⑥《敬告會議對付美約之諸君》，香港：《廣東日報》，1905年5月23日。
- ㉓《論內地宜廣設商會》，上海：《申報》，1905年6月10日。
- ㉔《設立講報所說》，上海：《新聞報》，1905年6月21日。
- ㉕《論政府宜竭力援助外交官》，上海：《外交報》，第109期（1905年5月18日）。
- ㉖⑤②《論對待美禁華工事》，上海：《時報》，1905年6月15日。
- ㉗《論美國凌侮華民》，上海：《警鐘日報》，1904年4月22日。
- ㉘③①《論華商集議抵制美國華工禁約》，上海：《時報》，1905年6月21日。
- ㉙①《論不知國家事者之誤國》，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6月25日。
- ㉚③⑥《本報記者與益聞西報書》，天津：《大公報》，1905年6月26日。
- ㉛《告白》，天津：《大公報》，1905年6月11日。
- ㉜Anti-American Agitation and Action Thereon, July 13, 1905, *Di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Amoy 1844-1906*, No. 38.
- 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中美往來照會集：1846-1931》第10冊，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26頁。事實上，柔克義在向清政府軍機處施壓的同時，還利用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對該報進行打壓並迫其停刊。對於抵制美貨運動，袁世凱認為，“我國民氣如此之盛，已足以令美人知懼，此後即當壓抑風潮，以免釀成交涉”，故他便成為當時少有的“地方當局對抵制運動自始即持反對態度者”。對天津《大公報》，袁世凱竟下令實行“三禁”，即郵局禁送、鐵路禁運、人民禁閱。結果《大公報》被迫於8月19日暫時停刊。參見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第67頁。
- ㉞③⑧《北京學界同志敬告全國學生文》，天津：《大公報》，1905年7月10日、12日連載。
- ㉟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清末）時事採新匯選》第十三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6886~6887頁。
- ④⑩《短評：拒約報其果停辦乎》，香港：《有所謂報》，1905年11月29日。
- ④②《弁言》，《中國抵制禁約記》，上海：上海民任社，1905年，第1頁。
- ④④《記紳商在務本女學堂會議不用美貨辦法事》，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7月20日。
- ④⑤④⑥《論抵制工約宜以不定美貨為正辦》，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7月29日。
- ④⑦《記馬相伯先生論美約事》，上海：《中外日報》，

1905年8月17日。

④⑧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6頁。

④⑨《張君季直等覆商部左丞唐君函》，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9月8日。

⑤⑩《喜喜喜拒約會出世矣》，香港：《有所謂報》，1905年7月9日；《廣東拒約會萬歲！》，香港：《有所謂報》，1905年7月18日。

③⑤⑥《抵制禁約與中美國交之關係》，日本橫濱：《新民叢報》，第68號（1905年5月4日）。

⑤④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彙編（1903—1911）》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92頁。

⑤⑤張謇著，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編：《張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9頁。

⑤⑧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第68頁。

⑤⑨《駁阻擾抵制工約》，上海：《新聞報》，1905年6月28日。

⑥⑩《論天津解散團體之可惜》，天津：《大公報》，1905年6月29日。

⑥③駿男：《禁用美貨之結果可危》，香港：《有所謂報》，1905年7月6日。

⑥④《同文教習溫君丹銘對於抵制美約之演說》，上海：

《時報》，1905年7月8日。

⑥⑤《增廣抵制美約事》，上海：《匯報》，第44號，1905年7月12日。

⑥⑥⑥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組織整理，程煥文審訂：《美國政府解密檔案（中國關係）：美國駐廣州領事館領事報告（1790-1906）》，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1頁；第348頁。

⑥⑦《論抵制美約》，上海：《外交報》，第117期（1905年8月5日）。

⑥⑧《電傳上諭》，上海：《中外日報》，1905年9月1日。

⑦⑩《論華人抵制美約踴躍之可敬》，廣東汕頭：《嶺東日報》，1905年8月12日。

⑦①《對外政策概論》，上海：《大陸》，第16號（1905年10月8日）。

⑦②《論中國對外政策之源流》，上海：《萬國公報》，第202冊（1905年11月）。

⑦③《論民氣之關係於外交》，上海：《外交報》，第130期（1905年12月11日）。

作者簡介：曾榮，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廣州 510420

[責任編輯 陳志雄]